



中国民主党派与 人民政协的建立

ZHONGGUO MINZHU DANGPAI YU
RENMIN ZHENGXIE DE JIANLI

◎于小英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主党派与人民政协的建立 / 于小英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220-08707-3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民主党派—概况—中国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概况 IV. ①D665②D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725 号

ZHONGGUO MINZHU DANGPAI YU RENMIN ZHENGXIE DE JIANLI

中国民主党派与人民政协的建立

于小英 著

责任编辑	董 玲
装帧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何秀兰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0.7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707-3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前 言

民主党派是指在中国大陆范围内，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它们分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民主党派”一词既是一种政治称谓又属于历史范畴。称其政治称谓者，盖指“民主党派”为特定意义之概念，专指那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或参政党。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党派称为“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由此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政治概念，专指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共产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中间党派。从此，民主党派作为规范用语一直使用到现在。称其历史范畴者，因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党派性质及其表述皆有差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中国民主党派大都成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陆续产生了包括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并入其他党派的民联、民促、救国会等民主党派。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是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的发展相始终的。要理解中国民主党派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就必须把它放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生态中去剖析，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去找寻。民主党派作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具有光荣

的革命斗争历史，并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共同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结为政治联盟——各民主党派作为一个代表中间政治力量的整体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同盟军。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始于大革命失败以后，民主党派组织大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并得到极大地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共同斗争中密切合作、风雨同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尤其是共同促成旧政协会议的召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的民主传统。周恩来曾经指出：旧政协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国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中国共产党在旧政协倡导的政治协商方式，为创建人民政协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族各界人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力武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公开宣言抛弃中间路线，拥护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以中共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一面倒的形势”^②。这标志着中国的各种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最终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汇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全面确立。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并为逐步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共同创立了新中国，开启了人民政协崭新的历史篇章。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共同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结成团结合作的友党关系，在友党关系的基础上民主党派确立了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立场，由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又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执政党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② 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参政党的关系。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和党际关系比较，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在政治道路、政治目标、政治路线、政治纲领等方面的合作，体现在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等方面的合作，体现在政权关系和互相监督中的合作。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开辟了广阔的渠道。

中国民主党派历经八十余年历史沿革和复杂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现在的基本阵营，具有今天的历史地位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其中充满着艰苦卓绝的探索历程，蕴涵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认真地梳理各民主党派缘起及其历史演变，追寻其创始人及领导人的思想轨迹，分析其肇始背景及其纲领主张、组织状况的发展过程，对于客观地反映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斗争和地位作用，对于公正地评价它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及其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功绩，以及对于凝聚政治共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 录 || 中国民主党派与人民政协的建立

CONTENTS

前 言	1
-----------	---

序 中国近代政党的兴起与现代政党的产生	1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21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22	
------------------------	--

一、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23	
---------------------------	--

二、中共三大确立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政策 /26	
---------------------------	--

第二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及其影响 /30	
------------------------	--

一、国民党一大与“三大政策”的制定 /30	
-----------------------	--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 /33	
--------------------	--

第二章 国民党民主派的形成和中间势力的聚集	46
-----------------------------	----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治结构分析 /47	
-------------------------	--

一、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分野 /48	
---------------------	--

二、国民党民主派的形成及其反蒋活动 /55	
-----------------------	--

第二节 抗日救亡运动和中间势力的聚集 /64	
------------------------	--

一、《八一宣言》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 /65	
--------------------------	--

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七君子事件” /72	
-------------------------	--



第三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间党派的联合	82
第一节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 /83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形成 /83	
二、中共南方局与中间党派的联合 /90	
第二节 国民参政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 /103	
一、国民参政会与民主宪政运动 /103	
二、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及其活动 /110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各民主党派的建立	123
第一节 中共对新民主主义政权形式的探索 /124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 /124	
二、中共“民主联合政府”的提出与重庆谈判 /138	
第二节 各民主党派的建立及其政治主张 /151	
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158	
二、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建国主张 /172	
三、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187	
四、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202	
五、第三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216	
六、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活动 /225	
七、九三学社的建立及其活动 /234	
八、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建立及其活动 /245	
第五章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和人民政协的创立	258
第一节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与筹备新政协 /259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探索 /261	
二、《论人民民主专政》与协商民主思想的形成 /273	
第二节 新政协的召开和人民政协的创立 /282	
一、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283	
二、新政协的召开与民主党派参加政权 /302	
结束语	324

序

中国近代政党的兴起与现代政党的产生

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党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议会斗争和自由民主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首先是在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对于“政党”的解释：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纲领的政治组织。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认为，政党产生及其存在的最深刻原因，首先在于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其次，政党又是一定阶级力量同一定政治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列宁认为，政党是近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具体环境下的产物，和政治发展的特定进程直接相关。他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①，“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②。由此可见，列宁强调政党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各政党之间的斗争是各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集中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与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宗旨——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与建党之初地下斗争的险恶和战争年代惊心动魄的斗争有关。

在我国，对于政党的定义、政党产生的政治基础的分析 and 阐释大多引用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列宁的政党学说。事实上，政党之间的斗争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现代生活里，民众的参政议政大都是通过政党这种组织形式来实现的——政党把公民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公民通过政党监督来影响政府的运作。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使政党成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充当着代议制民主的主角。在现代社会，政党是民主政治运作的主体，民主政治通过政党来实现是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因而，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民主政治运作的主体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者、组织者。

过去，我们在阐释“政党”的含义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既然西方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不同，其组织结构、纲领政策、活动方式、执政方法也就完全不同，因而不同性质的政党之间不存在什么可比性。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我们对其他政党的实践视而不见，对其他政党在执政中积累的经验不屑一顾，对他们的失误和教训置若罔闻。由此，对于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研究表现出眼界不够宽、思路不够广、方式不够新、思维方式单一等突出问题。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去阐释“政党”含义的，提出政党是指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中的活动分子，基于共同的意志，为了共同的利益，采取共同的行动，以期获得或维持政权，或影响国家权力的运作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其核心是说清楚“政党”是什么，并从最本质的内容上揭示政党的性质。随着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党政治作为当代民主政治的典型模式，主要由国家、政党、社会这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政党成为沟通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工具。因此，我们在研究政党和政党政治时，不仅需要说清楚政党的性质，也需要说清楚政党的功能。这实际上涉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如何面对公民社会这个更本质性的问题。总之，全面研究政党问题，需要多视角地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and 研究方法，拓宽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野，并从政党比较的视角去看问题，借鉴世界上各类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并吸取教训。

一、中国近代政党与政党政治的出现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政党和确立政党政治的国家。英国政党政治兴起的前提，是在复辟王朝时期诞生了辉格党与托利党这两大政党。1689～1714年间，随着王权的衰落及其议会主权地位的上升，政党政府被组建起来，近代英国的政党政治随之兴起。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是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政治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近代中国的政党及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兴起则与西方决然不同。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是和“救国”与“强国”意识、“改革”与“革命”手段紧密结合的。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从民国初年多党竞争到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最终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演变。

“君子不党”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中有“黨”（党）一词，只是中国士人一向以君子为名，恪守“群而不党”之原则，自然不肯与党有涉，恐因结党而失君子之度。这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观念有着重大差别。事实上，中国的近代“政党”观念是从日本移植而来。日本人在19世纪中叶，首先把德文“partei”用汉字译为“政黨”或“黨”，专指“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活动的现代政治组织”。及至近代，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需要运用一种新的工具——政党来打破僵局，创造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国家。于是，国人把西方政党与政党政治介绍到中国，认为英文中的“party”，德文中的“partei”，法文中的“partie”与中国过去的“黨”在“团体”这一层面上有词义上的契合和相通之处，遂采用了日语的汉字译法“政黨”或“黨”。与西方政党的产生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国政党和政党政治发育、发展的全过程。他们自国外引入“政党”概念，并在接受、传播和改造这一概念的过程中，身体力行地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政党与政党政治的

实践，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消解了国人对“党”的传统歧见和心理障碍。只是近代知识分子对“政党”与“革命党”作刻意区分，造成了国人对政党知识的某种误读，这种误读直到五四时期才被逐步纠正过来。

（一）中国近代政党的建立

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极力争取华侨和留学生，宣传其维新变法的主张。接受了西方新文化影响的留学生们通过结成社团、创办报刊，或者通过翻译日文文献介绍新学说、新学术。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的《民报》以及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新民丛报》等。早在《清议报》时期，梁启超等人即明确指出，“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之无党”^①。到《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不仅对欧美及日本的政党活动着意介绍，更屡次为文，阐发两党政治的理论。1894～1905年间，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领导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冲破清政府的禁令，先后建立了强学会、保国会、保皇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数百个高度政治化的组织团体。除少数团体一度为半合法组织外，余皆处于非法状态。这些组织团体不仅直接领导了此间的各次政治活动，而且为随后兴起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政党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组织基础。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等人汇集各种革命团体，创建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极大地推动了致力于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改良派利用预备立宪，特别是利用1908年后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与活动的机会，从这些相仿于议会的机构中合法地建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等改良主义政党。在这些具有一定全国性的政党性组织之外，各新兴阶级阶层成员也积极争取，通过其他多种形式组织起来。迫于社会压力，清政府也不得不表示，结社集会“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悖于

^① 转引自张玉法：《民国初年对政党移植问题的争论》，《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2页。

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①。1908年间，清政府正式颁布《结社集会律》，尽管其中诸多限制，但毕竟在形式上承认了人民结社集会的一定权利。

自此，各种社会政治团体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建立起来。以规模和系统而论，以知识界人士组成的教育会和商会组织最为浩大，也最为完整。前者设有全国性的中央教育会机构，后者设有全国总商会的筹备机构。其相关组织分布于许多省份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消息相通，行动一致，对国内社会政治生活颇具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并非单纯的专业化利益团体，实际上发挥了很强的政治功能。其领袖和骨干成员，往往是新兴阶级和阶层的政治代表，在政治领域极为活跃。如张謇、汤化龙、郑孝胥、蒲殿俊、谭延闿等人，既是教育会和商会组织领袖，又是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重要成员，同时还是改良派的要角。1909年间，他们发起了纯政治性的“国会请愿同志会”，遍设组织于中央与各地方，随之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在国会请愿同志会及其领导的立宪运动中，这些专业化团体实际上充当了最有力的组织基础。

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选择了民主共和模式，与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欧美民主宪政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如进入法政大学的清末留学生宋教仁、汤化龙、居正、张知本等，在日所接受的法学启蒙强调民主原则下的国民主权和权力分工，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他们回国之后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在1911年10月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后，由他们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奠定了民国宪法的基础。该约法草案所体现的民主共和国理想，经由辛亥首义及湖北军政府的实践，更为民国临时约法所承继，民主宪政也为国人初步了解。

（二）民国初期政党政治的引入

民国肇建，中国进入所谓政党和政党政治时代。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土崩瓦解，南方首义之区的新兴阶级、阶层最先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表现出极其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民初政党与政党活动的风潮随之从这里引发。中国仿效西方建立多党竞争的议会制，组党风潮四起，出现了中国历史

^① 《宪政编查馆拟订结社集会律折》（1908年3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上仅有的政党林立之景象，建党办报一时蔚然成风。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等先声夺人，在社会主义研究会基础上，率先于上海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承认为党者”的“中国社会党”^①。

1912年2月12日，清廷退位，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覆灭的大局已定。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一步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人们结社组党、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和权利。加之民初浓烈民主氛围的刺激，社会各阶层成员，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成员积极行动，创立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试图以此夺取或控制政权，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利益的分配。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②。其时“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③。总之，无论就政党之数目抑或政党之社会影响，其势头不可谓不盛。

1912年后，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组织公开化和组党运动便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不仅原有的革命团体和立宪团体纷纷改为政党，国人之从事政治运动者亦大都列名党籍，或利用不党之名，三五结合，俯仰于诸党之间，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掀起组党高潮。光复会会长章太炎成了组党的急先锋。章太炎回到国内不久，即于1911年11月29日到苏州联合前江苏巡抚、时任江苏都督程德全，筹备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其创办人都是章太炎开列名单联络来的，个个都是国内各省的“宏硕之士”，其宗旨是“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章太炎为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原立宪派人士唐文治、张謇、熊希龄等成了骨干分子，并发行了《大共和日报》。章太炎在演讲中公开声明“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清帝退位以后，章太炎又于1912年3月2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设立宗旨为“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在“统一党”成立以后，章太炎拥

① 怀霜：《中国果有党争乎》，《天铎报》1912年3月3日。

② 丁世峰：《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1913年5月。

③ 冰心：《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护袁世凯，同情梁启超，招收梁启超的门徒，处处与同盟会的政策对立。

因此，民初政党与政党活动一开始便处于群雄并起、互相角逐的竞争性状态。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能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光复会员、浙军司令朱瑞在黄兴当上陆军总长以后，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为“汉阳败将”。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

此外，在民国初年活跃的政党还包括孙洪伊、汤化龙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参议员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范源廉、黄远庸等人发起的“国民协进会”，黄群、籍忠寅组织的“国民公会”，温宗尧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此国民党非后来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等，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

据学者统计，从1911年武昌起义起到1913年底止，新成立的公开会党共计682个，其中政治性的政党有312个。^① 这些政党时聚时散，彼此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党争，都不遵守议会制的运作规则，形成了民初特有的政党政治失范现象。

究其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革命党人素来倾心于西方政治文明，一贯视中国传统弃如敝屣的心态有一定关联。这些人以为引进西方政党及政党政治自然不会有朋党相争之痼疾，因而把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作为革命成功后的当务之急。然而，西方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运作规则，乃西方民族在长期应对其自身政治环境的实践经验中，通过无数次的尝试而逐渐形成的。这种规则已经与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和文化传统密切联系，与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契约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各因素之间有机的制约关系。

^①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2页。



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与这一套与议会民主制相适应的文化、社会、经济与法制的相互依存与制约条件。中国是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朋党、牛党、李党、清流党，几乎等同于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于朝政乌烟瘴气的代名词。政党本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清末虽有政党出现，但大多是在海外建立或活动，国人对政党知之甚少。因此，民初组党之风盛起，人人以为皆可为党，此起彼伏，趋之若鹜。加上中国古代有朋党斗争的政治传统，因而形成了以地域之争、政策之争和意气之争为特点的民初党争。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力图使本党的利益最大化。不但同盟会及其改建的国民党如此，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三大政党皆如此。加之缺乏制度上的有效监督，恶性党争的政治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却很大。于是彼此相互仿效，恶性循环，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政党政治脱序现象。

二、新知识阶层的出现与新式政党的产生

五四运动是一场由新式知识分子阶层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其领导层完全是由一代新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五四运动一直被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正是五四运动直接推动了改变现代中国历史的两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崛起。在中国现代政党的研究中，以往更多关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外部影响，而忽视了“五四”前后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的内在创造。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来看，中国新知识阶层的产生，使得中国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

（一）五四运动与新知识阶层的出现

由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创建可以感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明显不同，知识分子的传统印记日趋弱化，更具有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反帝反封建的独立性特征。“五四”以后，这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方面着手在知识青年中建党以加强党的训练并完成

“改造政党”的任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国共合作以实施“改造国家”，最终在“改造政党”与“改造国家”的实践推演中，逐步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党政党发展路径的改造政党、变革中国的有效途径。由此，中国的政党与政党政治发展开始摆脱西方政党与政党政治的“议会政党”发展路径，走上了以建党实现建国、以改造政党实现变革中国的现实革命道路。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直接的是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变革，新知识阶层的出现。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校大量涌现，一个庞大留学生群的出现，成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为显著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05年留日的中国学生就达8000人，1906年猛增至13000人。至1910年，留美的中国学生“约八百余名”。他们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大多接受了西方的新学，对中西文化进行长期比较并具有思辨力。他们不承认一切传统权威和各种教条，要求打破一切精神枷锁，用“理性”来批判和审视一切，归国便成为新思想的宣传者。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自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①，他以进化论为武器，发动了一场针对儒教、反对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教育和培养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1919年“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德先生”（Democracy即“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即“科学”）。他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②。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如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使《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次集体亮相，中国新知识阶层由此产生。

《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坦言道：“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成长。他们与辛亥时期革命派中出身华侨或华侨资本家、官僚和大地主家庭

① 《青年杂志》至第2卷第1期改名为《新青年》。

② 《新青年》6卷1号。

者稍有不同，更具有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叛逆精神和独立性特征。他们处在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中，又恰逢文化多元、社会思潮涌现的时代，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五四”前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五四”前后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各种刊物猛增至400余种，各种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如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如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这些报刊和社团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成为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

“五四”前后，也是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纷呈涌现的重要时期。其社会思潮之演进呈现了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到否定，社会主义因其建构国家之间“平等”、“互助”的价值理念而广受欢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社会主义成为热门话题。流风所及，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安福系的王揖唐，直至投机政客江亢虎都大谈社会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纷纷涌现，如中国社会党的“纯粹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吴稚晖、郑佩刚等人的工团主义，梁启超、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周作人等人的新村主义等等。“五四”以后，出现了多次文化论争，如“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兴起，中国现代文化出现了多元思潮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为突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推动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中国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他们极力宣传十月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了解，社会主义